

王朝的背影

宋宪尧 宋佳音 著

《宋史》卷六十四载：

“政和三年九月，大飧明堂，
有鹤回翔堂上，明日，又翔于上清宫。
是时，所在言瑞鹤，宰臣等表贺不可胜纪。”



鳳凰出版社

王朝的背影

宋宪尧 宋佳音 著

《宋史》卷六十四载：

“政和三年九月，大飧明堂，有鹤回翔堂上，
明日，又翔于上清宫。
是时，所在言瑞鹤，宰臣等表贺不可胜纪。”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朝的背影 / 宋宪尧, 宋佳音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506-2586-0

I. ①王… II. ①宋… ②宋… III. ①《水浒》评论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9055号

- | | |
|---------|---|
| 书 名 | 王朝的背影 |
| 著 者 | 宋宪尧 宋佳音 |
| 策 划 | 无锡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责 任 编 辑 | 吴 琼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印 刷 | 无锡轻工大学印刷厂
无锡市荣巷大池东路, 邮编:214065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24.25 |
| 字 数 | 433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586-0 |
|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0-85808997) |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老人匆匆的脚步走到公元959年的时候，似乎犹豫了一下。当他俯瞰中原大地的时候，正在上演的一幕使他最终决定该把手中的权杖交给谁。

此时正是后周显德六年，世宗柴荣大举攻辽，仅42天间，连收三关三州共一十七县。当他正欲乘胜收复燕云十六州时，病倒了，被迫回师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壮志未酬然寿限已到，死神已经在他的床前张开大网。当年6月29日日暮时分，柴荣病逝，其子柴宗训在灵柩前即位，年方七岁，是为恭帝。

显德七年春，北汉连结辽国入侵，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衔命出师御敌，军至陈桥发生兵变，被部众黄袍加身拥立为帝，遂引军还师大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面对重兵在握的昔日臣子，周恭帝宗训只得禅让帝位。

赵匡胤即位，是为太祖，国号大宋，改元建隆，书写了兵不血刃，仅以一件黄袍披肩就改换了一个朝代的历史，《中国成语字典》里的“黄袍加身”即出自此典。这一年是公元960年。

在之后的大约二十年间，宋王朝先后征服了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后蜀、南平等国，统一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中原大地和长江流域，以及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终于结束了自唐亡以后五代十国将近八十年的战乱局面，但广大西北地区仍由中原周边的游牧民族实际控制。此后赵宋王朝再无能力恢复汉唐版图，只能先后与金、辽、西夏诸国形成共存同在的政治军事格局。因此，终宋一朝，北方的广大区域始终没有被真正划进宋朝的版图。

有感于五代十国时期武将拥兵自重、军阀割据对华夏大地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赵匡胤常常反躬自问：“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他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答案：以武立国，以文治国。

因此，对于文化人，中国历史上除了盛唐之外，再没有哪一个王朝如宋朝那样

优容宽厚。据说，宋太祖开国后第三年，即密镌一碑，立于太庙之密室，凡新帝即位都要到碑前默诵，其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等语——以“誓碑”这样庄重的形式立下“优容文士”的国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宋代文学艺术氛围空前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对后世有着深刻影响的大师巨匠，铸就了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座巍然的丰碑——宋代是一个文风昌盛的朝代。

相较于其他朝代，赵宋历代君主的品性似乎更趋向于文人化，大多比较平和。以太祖赵匡胤为例，虽然考虑到自己立国也是靠手中的军权制造不流血的兵变得逞的，深知手握重兵的武将会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但他并没有如宋之前的刘邦、宋之后的朱元璋那样“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大肆杀戮功臣，而是选择了请昔日的老兄弟们来喝顿酒，以“杯酒释兵权”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解除那些高级将领们手握的重权，谈笑间便轻巧地化解了君臣之间的历史难题。

然而，由于赵匡胤过分注意自己发动“陈桥兵变”的“历史之鉴”，过分强调“以文治国”的一面而忽视了“以武立国”的一面，人为地削弱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军事强势和应有的战争能力。

须知，国家利益和领土安全都是需要强大的军力来保证的。

同时，为抚慰高级将领交出手中兵权后的失落情绪，灌输“人生如白驹之过隙”，生命短暂，要及时行乐的思想，公开鼓励他们“多积金钱，厚自娱乐……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为以后官场文武官僚们的大面积腐败种下了祸根。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方面，宋王朝输出利益，以“岁币媾和”的方式为代价，换得了相对的和平环境。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御驾亲至澶州与辽议和订约，史称“澶渊之盟”。具体内容是：宋朝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辽贡宋马二万匹。自此宋辽116年间基本无战事。《大宋宣和遗事》里有一句话：“消熔军器为农器，毁折征旗作酒旗。”当时的这种社会现象，对宋朝这一时期的绥靖政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虽然赵宋王朝这种消极的防御国策和他的如意算盘，在后来与游牧民族之间频发的军事冲突中暴露出了致命的缺陷，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平心而论，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百多年宝贵的和平时期，为宋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翰林图画院供职的张择端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真实地记录了徽宗宣和年间汴京地区繁华极盛的城市生活景象。从画卷中可以看出，宋朝通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早已弥合了历史留下的战争创伤：人口稠密、市井繁荣、屋宇鳞次栉比、水陆交通畅达，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东京梦华录》载，其时光汴京一城的人口已达一百多万，这个庞大的城市人口数字是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也正是盛世的表象掩盖住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实质，畸形的繁荣，误导了执政者主观上应该具备的自省能力和对客观世界应有的判断能力，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头脑发热，无限放大自己的可能。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宋朝毁约叛盟，并联金攻辽，相约灭辽后，后晋在公元936年所割予辽国之燕云十六州归还于宋，而金则取该一十六州的财帛、人口，宋再以每年致辽之岁币改缴金国。事实上辽亡后，宋朝得到的是一块满目疮痍、无人防守、又无人愿意居住的飞地，还没等画进大宋的版图，便成了金军南下攻宋的跳板。至此，宋、辽、金三国相互制约的军事平衡格局不复存在，宋王朝直接暴露在了金的军事打击面前，赵宋的亡国之路由此而始。

另一方面，在国内，从徽宗崇宁四年开始，登基仅5年，酷爱艺术的赵佶为一己之癖，大兴“花石纲”。宋人所著《大宋宣和遗事》里所载：“上（徽宗）颇垂意花石……已称圣意，后岁岁增加，遂至舟船相继，号作‘花石纲’，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黄帕遮复，指做御前之物。不问坟墓之间，尽皆发掘。巨石者高广数丈，将巨舰装载，用千夫牵挽，凿河断桥，毁堰折闸，数月方至京师……”“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舍，人民劳苦，相枕而亡”的描述基本可信。

如此毁家亡国之“纲”，举国之食禄者竟然无人站出来劝谏，却反而争相迎合，各级官吏乘机从中浑水摸鱼、搜刮肥私，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使得长期积累的各类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宣和六年，“尚书右丞宇文粹中言：近岁……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多，一切取足于民……民不聊生”（《宋史》卷一百七十九），“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谨，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食者……”（《大宋宣和遗事》），正是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因此，到了徽宗宣和年间，虽然社会表面看似繁华依旧，如《清明上河图》里所描绘的那样达到了极致，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宋王朝的综合国力已经由盛转衰。

以铸钱为例：钱币代表着国家的尊严，是国力的象征与体现，所以，宋在建国之时，赵匡胤就十分注重铜钱的品质。“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腊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

市”（《宋史》卷一百八十）。铜在中国古代属于贵金属，每一枚铜钱的重量相当于它本身的实物价值，因此，凡“轻小恶钱”及“铁腊钱”都在禁铸、禁用之列，违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至徽宗朝中后期，贪风愈烈，以蔡京为例，“京所私侵，以千万计”（《宋史》卷一百七十九），大量铜钱流入贪官私库。再加上国力已弱，只能铸造夹锡钱上市，也就是在铜里兑锡，或干脆铸造铁钱。比如“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虽然从外表上看，钱上的铭文还是赵佶书写的瘦金体，但实际上钱币已经大幅贬值。《宋史》卷一百八十载：“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非但改变了铜钱的品质，形成了铜钱、铁钱同时流通的混乱局面，还“随时立制”，钱币滥铸滥发到了不可控的程度，“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宋史》卷一百八十）。与此同步的是，朝廷的信誉也随之贬值，直到荡然无存。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官场的大面积腐败、金融秩序混乱、黑恶势力猖獗、法律受到挑战、伦理道德被颠覆、评判是非标准扭曲、人心浮躁、信仰缺失、社会动荡，是一个朝代即将覆亡的预警。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军事上的不堪一击势不可免，事实上，北宋已经站在了历史的拐角处。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建国仅十年的边陲小国金国，继灭辽后，尽起全国之兵，向中原大国宋王朝发起大规模进攻，百万宋军兵败如山倒，各地告急，朝政动荡。在此严峻的情势下，岁末，宋徽宗发“罪己诏”，对自己临御二十多年来的失政、失德行为作出检讨，大意是：“多年来言路壅塞，阿谀充耳，致使奸邪掌权，贪饕得志，贤能之士陷于谗言，缙绅之人遭到流放，朝政紊乱，痼疾日久。而赋敛过重，夺百姓之财，戍徭过重，夺兵士之力，利源枯竭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可谓民生潦倒，奢靡成风。灾异屡现，而朕仍不觉悟；民怨载道，朕无从得知。追思所有的过失，悔之何及！”（《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宋纪》九十五）。然此时醒悟而“罪己”，为时已晚。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赵佶自觉无颜再占帝位，遂将这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丢给了儿子赵桓，是为钦宗。但时局糜烂已无力回天，光换一个皇帝有什么用呢？在后来和金国的交战中还是屡战屡败，金兵南下势如破竹，面对女真铁骑，朝堂无策，北宋之亡已成定局，非人力可挽。

1126年11月汴京陷于金，钦宗乞降。随后，金军将皇宫内和京城里所有金银财宝，字画古董，户口典籍，凡是值钱和有用的东西全部洗劫一空，虏掠北返。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军破城的时刻，城内守军以及周边勤王的宋军还有数十万之多，总兵力

仍几倍于金军，却眼睁睁地看着京城陷落而不奋力相救，乃至皇帝都做了异族的俘虏。那些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和特权，把公权力当成谋私利的摇钱树，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文武官吏，他们此刻在哪里？那些一言不合，便对自己的同胞“大脖子拳”招呼上去，甚至“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或者干脆抡起大斧“排头砍去”的“好汉”们，对异族的入侵为什么显得如此无能？他们此刻又在哪里？他们忙着享受攫取金钱的快感，他们忙着享用大碗酒大块肉的快活，他们个人的私利与诉求神圣不可侵犯，而国家兴亡、民族安危则与己无关。

他们不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历史提醒我们：

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力强大，而腐败及因此引发的人心向背却能导致亡国灭族！

盛世的出现，要靠一天天、一年年的苦心积累，而乱世的来临，只需一夜便会崩溃！

公元1127年3月间的一天傍晚，残阳如血，一大群衣冠男女在金兵的押解下离开汴京，在关外的滚滚黄尘中蹒跚北行。在这个三千多人的队伍里行走着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父子以及皇族后妃和天潢贵胄金枝玉叶们（《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列传》载：“郑皇后，开封人也……汴京破，从上皇幸青城。北迁，留五年，崩于五国城，年五十二。”这是史书对皇帝后妃同时被掳五国城的最直接记载）。此时距宋徽宗再次重启“花石纲”的大宋“盛世”仅六年时间，距《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景象仅只两年，是年，赵佶46岁。当他最后一次回眸身后，发现夕阳残照下的汴京雄伟的城墙已经变成了一条横卧在远处的橘黄色的地平线，京华已成烟云，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公元960年的那一幕，赵匡胤在征讨后汉途中的陈桥发动兵变，回师开封建立宋王朝走过的那条路，到了公元1127年，似乎讽刺性的，历史进行了又一次的回放，相隔了漫长的167年后，宋徽宗、宋钦宗“北狩”五国城，大致也经过了这段路。从此，繁华的京都只在宋徽宗的梦乡里出现过。

同年，侥幸脱身的康王赵构“泥马渡江”，几经辗转，建都临安，史称南宋。

公元1279年三月，宋、元在崖山海战中被元军大败，走投无路之下，南宋的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八岁的赵昺被宰相陆秀夫背负着跳入大海。南宋王朝从赵构渡江而兴到赵昺蹈海而亡，历时152年，这一兴一亡之间居然全由“水”成其因果，再一次证实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历史观的正确性，冥冥之中，不知上天是否早有安排。

一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拥有高度农耕文明的、有着

亿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怎么会战败于一个社会文明落后、生产方式原始、人口不足百万、偏居北方一隅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呢？

《水浒传》这部历史小说，大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小到当时的社会百态，都与《宋史》记载高度吻合。本书以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为线索，将之与《宋史》中宋徽宗登基后（1100）到汴京陷落（1127）的最后二十七年的史实相印证——这个既有着《清明上河图》的浮世繁华、《东京梦华录》的奢侈糜费，又有着为“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而不惜把“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个人诉求并存，腐败泛滥、法制虚设、道德颠覆的年代——重新评判故事中的人和事，有助于了解其中由偶然到必然的成因，我想，这便是《水浒传》这部历史小说想要真正告诉后人的。

让我们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抛开“农民起义”和“英雄好汉”的固有认知定式，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解读这个沉重的、已经远逝了的——王朝的背影。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毛泽东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

——李世民

古往今来，

人们都知道“以史为鉴”的道理，

但历史却一如既往地重蹈覆辙，

兴替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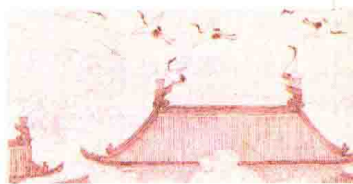
“以史为鉴”，

原来是历史写给自己看的，

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作者

目录



“遇洪而开”的历史背景·····	001
“九纹龙”是怎样变身为虫的·····	005
少华山上“捣糨糊”·····	009
从五台山到二龙山·····	014
“打虎将”与“小霸王”·····	019
从“林教头”到“豹子头”·····	024
“大官人”敌不过“小舅子”·····	029
以人油点灯的酒店·····	034
秀才造反，谁的悲哀·····	037
全是“鸟气”惹的祸·····	040
当“青面兽”遇到“白日鼠”·····	044
宋朝的“急先锋”成了宋江的“急先锋”·····	050
都头的江湖·····	053
“晁保正”不正·····	061
刘唐送礼·····	066
书生之毒·····	069
打渔杀家·····	074
“休叫走了一个”·····	080
“戏子”白胜·····	084
操刀鬼曹正·····	088
宋大哥的金字招牌·····	091

宋清之戏在书外·····	100
打虎英雄的没落·····	103
从“人肉馒头”想开去·····	113
我的爸爸是管营·····	118
富二代的怪圈·····	121
清风山上的醒酒汤·····	125
占着茅坑不拉屎·····	130
“镇三山”最终自己上了山·····	134
“及时雨”浇熄“霹雳火”·····	137
从“对影山”到“乌龙岭”·····	140
石将军原是石翁仲·····	144
夺命判官·····	147
李家溜溜的大哥·····	150
“威猛”走私盐·····	153
“病大虫”落草·····	158
“来也不认得爹，去也不认得娘”·····	161
为富不仁“没遮拦”·····	165
咳嗽有罪，杀人无罪·····	169
“排头砍去”的快感·····	172
假作真时·····	179
由裁缝到线人·····	183
四条汉子·····	186
笑脸的背后是朴刀·····	192
玩忽职守者戒·····	195
杨林的江湖·····	198
好这一口·····	201
又一个被“花石纲”逼反的人·····	204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07
刽子杨雄·····	210

石秀的扁担·····	213
假如时还不曾偷鸡·····	218
鬼脸儿杜兴·····	221
扑天雕不是好鸟·····	224
惟有一声叹息·····	227
一群“蛇蝎”·····	230
乐和其人·····	235
当之无愧“母大虫”·····	238
从强盗到强盗·····	241
近火先焦·····	245
徐宁的钩镰枪·····	249
从官军到强盗的转换·····	253
风雨芒碭山·····	265
来了“金毛犬”，去了“晁天王”·····	270
“玉麒麟”的沦落·····	273
花绣与招安·····	279
“下民易虐，上苍难欺”·····	282
“道全”去则“道君”安·····	286
本应该是艰难的抉择·····	290
没面目焦挺·····	293
丧门神与险道神·····	296
风流将军原是个下流坯子·····	299
张清们的不幸·····	302
“弼马温”皇甫端·····	307
《水浒传》梁山人物考析·····	310
“花石纲”断送了花花世界·····	315
甚荒唐，一毬踢进白虎堂·····	322
“宣和六贼”之下场·····	327
“醉了闲坐”·····	332

不得不说的两个小人物·····	334
做人不妨学何九·····	338
从“饶了不杀”说开去·····	340
白秀英倒在权力的雷区·····	342
王婆们的“棺材本”·····	344
“郓哥”现象是社会的硬伤·····	347
从“清风寨”看北宋的冗官体制·····	349
从《水浒传》中看宋代的娼妓业·····	352
《水浒传》中的宋代酒店·····	356
透过《水浒传》看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363
梁山以外的其他人物分析·····	367
书后闲话·····	370

“遇洪而开”的历史背景

《水浒传》第一回开篇：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

在皇帝面前敢于使用“民不聊生”这句成语，等于是打了皇帝老子一个耳光。一方面证明了该大臣不会粉饰、直面客观的正直的个人品格，另一方面，恰恰也体现了宋仁宗以他的仁厚，为他的臣下营造了这样一种和谐的议政氛围。那么，面对大灾，面对臣工的诛心之论，宋仁宗是什么态度呢？“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表现出了一个仁君应有的大度和责任。

宋仁宗赵祯（1010—1063），是宋代第四位皇帝，于1022年登基，在位42年，共使用九个年号，嘉祐是仁宗朝的最后一年。

嘉祐年间，大宋朝自然灾害不断，据《宋史·仁宗本纪》载：“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复决。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言江、河决溢，河北尤甚。”

另据《宋史》卷六十一记载：“嘉祐二年六月，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河北水潦害民田。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七月，京东西、荆湖北路水灾。淮水自夏秋暴涨，环侵泗州城。是岁，诸路江河溢决，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五月丁未，昼夜大雨。六月乙亥，雨坏太社、太稷坛。”

宋初时，天下划分为十五路，后来增分为二十六路，每路辖府、州、县若干，行政建制相当于现在的省。“诸路江河溢决”，说明受灾区域广大。

嘉祐元年、二年连续两年遭水的“安上门”是皇城主要的城门之一，高耸雄伟，

竟然两次被大水淹漫。“社”和“稷”是两位传说中的神，分别掌管土地和五谷，祭祀他们的地方便叫社稷坛，遍布全国各地，而皇家设在都城的社稷坛称“太社”“太稷坛”，是最庄重的祭祀场所，连这些重要的地方都被大水损毁，可见受灾程度严重。

除了水灾，嘉祐二年二月，“雄、霸州地震”，四月，“河北地数震”，“幽州地地震，坏城郭、覆压死者数万人”。

宋仁宗于“秋七月乙酉，命京东西、湖北监司分行水灾州军振饥蠲租。丙戌，赐河北流民米，压溺死者，赐其家钱有差。己丑，出内藏银绢三十万振贷河北。乙巳，贷被水灾民麦种”。

宋仁宗一方面赐米赐钱赐粮食种子，拿出自己内库大量的真金白银来赈灾，并“遣使安抚”，一方面又下诏让群臣针对“时政阙失”提意见。《宋史》上的有关记载与《水浒传》这部历史小说中：臣工奏请君上“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而仁宗下诏“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的文学描写基本相符，可见施耐庵并非是个专门骂娘的主，他对仁宗的评价基本符合史实。

由于宋仁宗早年特殊的人生经历，养成了他同情弱者，宽待臣下，“恭俭仁恕”的性格特征，在他执政的42年中，以“仁”治国，波澜不惊中，成就了非凡的历史功绩。提到“唐宋八大家”，相信大多数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能说得出口他们的名字，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的六个宋人都出自仁宗当朝的时期，他们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史书上大名鼎鼎的忠臣清官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杜衍和妇孺皆知的包拯包青天，都一并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这一壮观的历史人文景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只有在明君仁主的治理之下，才会造就出这些响当当的历史人物。

宋仁宗在生活上力免奢侈，以他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号嘉祐为例，“嘉祐元年春正月……戊辰，罢上元张灯”。古时三节为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分别为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是道教的重大节庆日，按例要燃放花灯，普天同庆。然因上一年的天灾，宋仁宗下旨“罢上元张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而宋徽宗赵佶却从来不考虑这些，置内忧外患而不顾，每到节庆之时，东京汴梁带头大张旗鼓放灯。在《水浒传》中，从东京汴梁城到北京大名府，乃至弹丸之地小小的清风镇，一到三元之节，官府带头燃放花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宣和三年正月十五上元之夜，宋江等人乘乱混入东京城，还调戏了道君皇帝的相好李师师，李逵则顺手在前客厅上放了一把火，差一点把李家勾栏烧个精光。而上一年的正月十五上元之夜，时迁乘着大名府燃灯节庆之时，偷偷

爬上翠云楼以放火为号，梁山人马乘乱攻入大名府，这把火几乎烧掉了大半个北京城。

对比之下，两个皇帝的结局应该可以预见。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于福宁殿，遗诏：

“丧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也就是说，依祖制，国家遇大丧，全体臣民应服丧守制三年，共计三十六个月，而仁宗遗诏以三十六天替代，陵寝规制务必俭约，这在唯我独尊的历代皇帝中是很少见的。

因此，他驾崩时，全国上下一片哀声，百姓自动为他披麻戴孝，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汴京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仁政甚至深远地影响到了敌国，当大宋专使将讣告送达辽国时，辽国百姓自发地上街祭奠悼念，辽帝执着宋使的手大声号啕。我们可曾知道，自汉以来，辽就是汉民族的宿敌啊，所有这些，全因为在仁宗一朝，宋、辽之间已经42年没有战争了。

七百年后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生平最佩服的三个皇帝，第一个是他的爷爷康熙，第二个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们的历史功绩注定会受到后人的敬仰与膜拜，而第三个就是不显山不露水，以仁治国、以仁惠民的宋仁宗赵祯。

最后，《仁宗本纪》赞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之于乱。”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仁宗执政期间，国家未尝没有弊端，朝中也未尝没有小人，但这些弊端和小人都不足以拖累、影响国家的根本，也不足以与朝中的正能量抗衡。由于君臣同心为政，才打下了两宋得以延续三百多年的执政基础，而仁宗的子孙却改变了他的方针，以至于国家产生了动乱。

虽然仁宗朝自然灾害不断，但因为他以仁政治国，以百姓为念，处置得当，社会和谐，国家得以顺利前行。到了他的重孙子徽宗朝时，由于官场大面积腐败的人为之祸，再加上官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甚至恶作为，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之危害就迅速凸显，其负面效应就会被无限放大。内忧外患之下，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便可想而知。

施耐庵显然是熟悉这段历史的，他以嘉祐三年（1058）的瘟疫为《水浒传》文学描写的入口，无缝对接了历史上两年的洪灾史实，符合大灾之后必有瘟疫的自然规律。为此，仁宗专遣特使上三清山请张天师赴京为百姓禳灾祈福，而这个肩负重

任的太尉既不姓李，也不姓王，却偏偏姓洪水的“洪”，这洪太尉干完正事之后顺路拐脚就闯入了“伏魔之殿”，巧的是殿中的石碑上就凿着“遇洪而开”四个大字，喜的他自认这是“天数”，令随从人等并力掘将下去。只听得刮刺刺一声巨响，“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几十年后，山东梁山八百里水泊又一次洪水滔滔，而这一次的洪灾是一群“来也不认得爹、去也不认得娘”的“虎豹蛇蝎”“魔鬼夜叉”们掀起的。

发生在1127年的靖康之变，正是“天灾人祸”的必然结果，金人只不过乘势而为，在即将倒塌的宋王朝大殿顶上加了一根稻草而已。